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68 期

88

第 1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趋势 · 底牌？

第 2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金融闯关？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五年五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参与举办的二次学术研讨活动的记录，即“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第1届和第2届。

“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是中国国内多家民间智库于2015年自发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不设立常设机构，每月由各单位轮流主办，就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目前加入的民间智库有：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华顿经济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等。其宗旨为“全国的问题，上海的声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声音”。

第1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福卡智库主办，主题是“趋势·底牌？”。与会者们对当下中国经济的趋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劳动力的供需变化、中高端产业升级的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2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主题是“金融闯关？”。与会者们探讨了有关金融改革的问题。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目 录

第 1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趋势·底牌?	1
上半场：智库代表的观点分享.....	1
下半场：与会者的互动讨论.....	24
 第 2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金融闯关?	40
上半场：智库代表的观点分享.....	40
下半场：与会者的互动讨论.....	55

第 1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趋势·底牌？

2015 年 3 月 30 日

“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是中国国内多家民间智库于 2015 年自发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不设立常设机构，每月由各单位轮流主办，就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目前加入的民间智库有：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华顿经济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等。其宗旨为“全国的问题，上海的声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声音”。

第 1 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福卡智库主办，主题是“趋势·底牌？”。与会者们对当下中国经济的趋势、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劳动力的供需变化、中高端产业升级的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上半场：智库代表的观点分享

王德培（福卡智库）：我想讲 3 大要点，每一个要点讲三个小点。第一个要点我讲三块多米诺骨牌，第二个要点讲三组模式的国际竞争，第三个讲三种新的经济力量在拖延着经济发展。三块多米诺骨牌也很简单，主要回答当下经济形势中错综复杂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三块牌。第一块是美国华尔街金融 CDS 的最终崩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第二块多米诺骨牌

是中国在 2012 年开始的去产能的实质化。由于第一块牌倒了以后，必然导致中国连带的影响，大宗商品啊、原辅材料啊采购和中国产能的萎缩，引发了第三块牌。那么第二块牌我再描绘一下，中国这块牌是斜而不倒，和其他两块牌不一样。由于中国萎缩了以后，大宗商品开始打对折了，石油、铁矿石，一系列的东西都在打对折。在打对折的过程中就引发了第三块牌，以俄罗斯为首的，什么巴西啊、委内瑞拉啊，金砖四国除了中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就开始倒下去了，印度发展还是可以的。他们倒下去了以后，我认为这场危机也到了后半段了，时间还有 3 到 5 年左右。所以在未来的 3 到 5 年这个时间段，是全球针对这一轮危机的最后的时刻。这就是三块多米诺骨牌，这三块多米诺骨牌彼此是具有逻辑关系的。说到这三块多米诺骨牌，我顺便说一下国内的舆论、国内的学术界的看法。国内的说法在网上是比较多的，就是说与政策有关系。北师大有一个叫钟伟的大家都知道，他就认为什么新常态，就是新萧条，有十大新萧条，第一个新萧条就是政治改革动力乏力了，没有政治改革动力了，经济改革的动力也没有了，南巡讲话那种背景不复存在了，等等等等。有鼻子有眼地讲了十个萧条。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也公开发表文章说，当下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策惹的祸。福卡关于三个多米诺骨牌的看法实际上和他们的观点有根本的差别的，我们是在一个世界范围内没有政策对和错的判断情况下得出这三个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倒下去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要点。那么再简要的对这三张牌前因后果简要的说一下。就这三块牌之前主要是两大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那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国策，然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际教育，经济改革就是 WTO，我也不

展开说了。那三块牌接下来那就是重新洗牌，世界各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在这一轮后危机时代重新洗牌，那么在重新洗牌最典型的案例，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将在这一轮洗牌中终于成为一个叫地区性大国，还有一个叫在军事上的世界性大国。而中国又将主导，十几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我在北京和许多专家争论很大，那么我当时的观点那就是中国进入起飞期，时间长达几十年，他们说我是瞎讲，我有我的推导，五加一个变量，他们说我是瞎说，但是高尚全是听进去了，他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我不去讲了。就是说最终中国将在这一轮的未来3—5年的洗牌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脱颖而出。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要点，三块多米诺骨牌。

那么现在讲第二个要点，三种模式，怎样能够快速走出危机去迎接一个新的格局，现在当下世界上是三种模式，这是比较经典的。第一种模式：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我举一个例子，本月的23号还是24号在美国召开了2000人的大会，主题词是投资美国。投资美国，奥巴马和习大大一样都去了，我们国家竟然有150位富人去了，而且我们2014年投资美国的增长幅度比2013年增长了41.6，这幅度是相当厉害的。所以美国模式很简单，那就是工业化的再造，回归工业化，这是当下的。但是我把它称之为是它的金融和原来量化宽松一样。那么第二个模式那就是中国模式。这两天新闻界的朋友都在这里，所谓的什么亚投行啊、一路一带等等。但这两个模式很有意思，美国人要求的是世界到它那里去投资，我们是到人家那里去投，美国人找的是富人，中国人找的是穷人，这是两种很大模式，这两种模式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不展开说，先讲一个结论。第三个模式就

是2013年德国汉诺威展览，德国提出来的工业4.0，这工业4.0也是欧盟地区以德国、北欧为首希望通过工业4.0能够迅速的走出危机。总而言之在当下世界上有这样的三种模式大家都在比学赶帮，试图要尽可能摆脱这场危机之困，然后在新经济的未来前景。那么说到这里我再简要的提一提，一般面对危机也就大概是这三种，一种是搞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中国版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国际化，一路一带实际上是固定资产投资来化解危机的计划，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们国家考虑的周边的国际环境和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那给个两大因素也是存在的，但是和周边地区这也是存在的，但我认为比较经典的就是试图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化解中国巨大的产能和周边国家的投资不够来把它给带起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通过滥发货币，滥发货币美国干的最早，实际上中国干的最大的，欧洲人直到今天刚刚反应过来。那么同时中国人还在干一个美国人干的最厉害的就是通过军火，我们国家这些年军火也是井喷的增长，民营企业见死不救，救也救不过来，国有的造船厂几乎订单排满，所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军事工业特别是海洋工业进入到了下饺子的阶段，所以中国在化解危机对外公开宣布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同时做两大事情，就是军火和滥制货币。所以我前面得出的那个结论我在后面都是有推导的。在这些推导基础上中国走出这场危机是必然的。

接下来第三个要点。三股经济力量，哪三股经济力量呢？我认为一股经济力量金融，第二股经济力量就互联网+，第三股经济力量就新经济。那么金融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下次的议题我建议是讨论金融闯关，顺便我先讲一下。

第一股经济力量那就是金融的力量。那么金融在2007-

2008年是金融把天捅破的，但是直到今天全世界不思悔改，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金融闯关的一个格局。2015年利率放开，资本项下全放开，人民币汇率要大幅度的进行自由化，所以我准备到北京去和他们吵架的，今天去，12号还要去，准备去为这个事情和他们争论，我不展开了。现在他们给它一个定义，就是相对于8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价格闯关，当下2015年是金融闯关。那么这一轮金融闯关对这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卢布是因为走上了自由的经典的市场经济道路，最后卢布贬了70%。那么如果是今年按周小川说在资本项下放开的话，那么我们国家会怎么样，这个争论很厉害。所以总而言之在全世界以美国、中国、欧洲、日本，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希望通过金融的，继续走金融这条路，尽管这轮危机就是金融把它捅破的，所以这是一股。第二股力量是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成为时髦的语言，经信部搞了一个互联网+，就经信部提出来的十大产业，第一个新的新型技术，第二个机器人的技术，第三航天航空，第四个海洋工程，我们现在在南海军事上的那种动作真的和这些设备是有关系的。第五个就是高铁，第六个就是新的动能汽车，后面几个比如说我们新的发电能力，再一个新材料，最后一个新的农业机械，就经信委它提出来十大产业，如果加了互联网说是可以提高20%。那么第三个力量就是其他类的新经济，这些新经济正在接二连三地登上历史舞台。比如说我现在提的智能经济。智能经济的发展、生物经济的发展、新的生命经济的发展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当我们旧的经济还在跌宕起伏，还处于什么拐点、高峰在进行调整的时候，人类新的经济接二连三的推上历史舞台，所以我把我的趋势底牌重新概括一下，三大要点，第一个要点三块多米诺骨牌，

第二个要点三种模式的比拼，第三个就是三股经济变量正在牵扯这经济的发展。我在这里的评论没有对和错，没有道德问题，我仅仅是研究趋势，研究它的态势的发生。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我讲三点。首先我的判断我们和刚才王德培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处于危机的第三阶段，08年是第一个阶段，急剧下挫，2008—2012年是全球性的从美国开始放水的货币政策一直到中国，除了欧盟动作晚一点，带动了全球性的滞胀。2013年开始进入了弱复苏的调整，现在这个阶段全球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收缩阶段。美国表现的是一个再平衡，它是略见成效，它毕竟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最成熟的国家，欧盟的去债务危机是步履维艰的，因为它主要是政治因素，基本上民主党为基础的一个经济体。日本自己的国民的消费倾向有问题，包括少子化、老龄化等等。新型经济体国家集体表现为开始是滞胀，经济失速，特别在巴西、阿根廷。然后伴着油价下行以后中国也有一个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行，变成一个通缩的倾向，判断时间短则2—3年，长的3—5年。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呢？我想看经济首先是看人，是人的经济行为决定的，这里我打一个比方，看一个经济走向就比看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首先要看他从哪里来的，然后再看看他到哪里去。那么我这里从两个维度来判断这个依据，一个就是说世界经济的一个维度。第二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盲人摸象的感觉，可以对经济形势下一个判断。

这里一个理论依据就是长周期理论，长周期可能在座的都知道是50年，所以说前20年它是一个增长，到后20

年它是一个下行，那么现在恰恰就是一个长周期下行周期。那么这个下行周期实际上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判断一个经济的走势周期最主要一个动力是看它的生产力的变化。我们看看朝鲜战争一直到现在整个世界的下行区间，国际生产力发生什么变化呢？有几个主线，一个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分工它从早先的水平分工一直到现在部门，行业里面围绕产业的价值链来配置到后来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兴起，国际间大量的分包，投资贸易走向一体化，所有的这些活动是由国际金融巨头主宰，所以它有一个走向，以重化工业为主体那么一个生产力到中国改革开放 90 年代一直到 2000 年的重化工业的快速成熟，包括核能、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计算机等等，一直到 2000 年互联网的兴起，开始有泡沫爆一下，信息化浪潮初现端倪以后，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全球的产业国际化分工已基本上布局全部完成。同时，世界银行、IMF、WTO 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基本上已经无力驾驭它了，这是世界经济的一个轨迹。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交集，80 年代前我们不讲了，中国是一个自我循环，由政府引导投资，由政府决策投资这么一个经济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由外资带动的重化工业体系快速完成，由出口导向带动的加工工业和地区经济发展快速完成，但是我们在这个所得基础上我们所失去的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失去了生态、环保、资源，这些是眼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人力资源的过度透支。我比较保守的说就是说 70 后、80 后甚至一部分 90 后过早的被加工工业吸收。所以这么一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共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供需失衡，还有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运

行失衡，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供需的是全球性的收入和分配的两级分化，以及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和国际之间的供需不匹配。所以危机的本质到今天我们实际上不用去点穿，主要就是我们全球性资本导向、不管什么制度下面资本主义导向，这个价值观导向下的全球性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失衡，那么这么一来面临着两大过剩这个全球性的共性问题，产能过剩还有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从中国前段时候放水到现在进入通缩跟调整是必然的，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是三级叠加效应。最后，现在两种观点，一种乐观的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把潜能看为现实的产业，另一种太悲观了也不至于。因为中国目前出了几招是现行体制下的最优决策，当然，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换个思路制度创新的话，这些招数还可以进一步优化调整。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讲三个问题。第一，就业问题今后还是不是应该关注？第二，中国经济走向中高端的过程形态是什么？第三，如何把国外的消费转向国内？

GDP 的增长速度与就业是正相关的，我们领导常常讲为了要保持充分就业必须保持 GDP 有较高的增长，这次总理报告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意思，这个说法现在不怎么对，以后也可能是错的。为什么？从劳动力供给来说，2012 年开始已经出现负增长，以后一直是往下去的。从劳动力需求来说，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持续放慢，但是它的增量并没有减少，增量也会带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第三产业还是急剧增长的，特别是第三产业增长的速度更快，对需求还是增加的（图 1）。

2.3、根据经济增量的大小，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产业就业弹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仍有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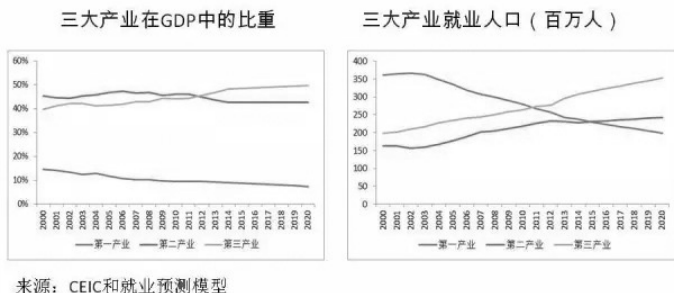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图 1：就业人口仍将有增加

3、城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以往城镇净增劳动力适龄人数大于就业净增人数，存在较大的就业压力。而根据我们模型的预测，在2015-2020年间，劳动力的需求将明显超过供给，每年约有600万的就业供给缺口。

城镇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百万人）



注：净增人数为前后两年总人数的差值；数据来源：CEIC和就业预测模型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图 2：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超过供给

最后我们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从2012年到2014年可以看到供给比需求要大，现在差不多了，以后从2015—2020年需求是大于供给的，就是说供给会出现缺口（图2）。以后劳动力供给需求会有变化，可能会导致工资增长比较快，这一方面可能拖累经济增长的速度，另外可能为企业的升级带来动力。今后不再是保增长从而保就业，更多的是就业供给满足不了经济增长的需求，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向中高端升级的形态是什么？总理政府报告当中讲到了双目标，一个是中国经济要迈向中高端，这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我没看到有人讲过这个过程。现在来看，这个纵坐标是我们产业的附加值，现在我们是比较低端的，发达国际是比较高的。我们以后怎么走上去，是平移过去还是怎么样？我至少没有看到任何人讲过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它不是平移，而是一个波浪形，它的低端还是会有一部分慢慢往上挪，原因是什么？一个，我们的对外开放的空间秩序是沿海往内地转移，企业过程也是的，民营企业两部分，一个传统工业一个是新的。国企要么是上游，要么是垄断，它的改革行也还没有完成。外企也是，它来的时候产品主要是销售到国际市场，现在要面向国内市场，它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是在国外，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平移上去，这是一个结论。另外还有劳动力的过程，我就不讲了。结论就是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它的形态不是简单的向上平移，而是波浪式的向上提升。它有什么含义呢？第一，我们要承认产业升级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性，不要搞一刀切。第二，互联网+很重要，但不是产业全部，包括刚才讲的十大产业，这很重要，但是不是全部。最近微信上面有一篇东西，讲现在误国的两个大佬，讲王健林跟马

云是罪魁祸首，这个说法不好听，但里面有些东西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设备包括我们的手工工具都上不了台面，并不是电商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政府要直接出面或者通过各类社会组织，或者由企业请国外的退休的工程师和技工来帮我们每一个企业出谋划策提高、培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现在媒体上面讲的不够，我看到中国制造业 2025 讲的不多。

最后，怎么把一部分国外的消费引向国内。现在出入境的逆差已经达到 1000 亿美金，当然这里面不完全是购物，还有许多其他消费。这个关键是什么？从去日本抢购马桶盖，就说明高质量、高端的消费品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一个是我们要逐步培养自己的品牌。另外，香奈儿在国内降价 20% 引起排队购买，就说明价格还是关键的问题。很多调查，70% 的回答与价格是有关系的。要不要对国外的奢侈品降低进口关税有很多反对意见，一个说法是要保护国内工业，这个站不住脚，因为以前你关起门来可以搞保护，现在人都出去了你就没法保护了，赚了钱总要消费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不能扩大不公平，前两年你们看报纸都是这么说的。最近说的比较多的意思是，关税降了，你好处也拿不到。我觉得这么讲没有根据，你看我们反垄断惩罚高通，里面有一条就是它故意定高价格，你政府可以干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能干预？没有这个道理。我觉得应该要考虑降低这个关税。我的意见很清楚，我们现在扩大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所得税不能动，什么不能动，这个进口奢侈品很快就可以做，做了以后鼓励一部分本来在国外消费的到国内来消费，提高国内消费，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扩大商业房地产的需求。我觉得这非常好，现在一部分人反对，讲的难听一点是有部

门的利益在里面，反对的人都是这个部门。我就说这些。

沈晗耀（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我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悖论和优化，也是三点。第一点悖论，第二点原因，第三点优化。

第一是讲悖论，套用一句名人的话，当前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所谓最好的年代，我们的经济总体上已经是数一数二，现在按照购买力平价是数一，按照现汇是数二，当然这是指好的方面，经济很强。另一方面则是最糟糕的年代。这个糟糕的年代体现在经济方面是发展失衡，两极分化问题突出，首先基尼系数已经到了 0.47 了，还有黄赌毒各种社会丑陋现象，五十年代已经绝迹了现在又到处蔓延，道德沦丧。所以说现在是最糟也是最好，这就是当前经济的悖论。当前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讲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需求问题。如果整个需求分三类的话，可分为私人品、公共品、创新品。所谓私人品，就是面包之类的产品，我吃了你就不能吃。公共品就是我的消费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还有创新品，比如 iPad、iPhone 之类由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其特点是供给创造需求。没有这个供给，就没有这个需求，供给出来会引导甚至创造更大的需求。由此看来现在仅仅是在私人品方面存在供给产能过剩，公共品供给是严重不足，创新品也是不足，所以总体上看，三大需求品有两大是供给不足。进一步讲，即使是私人品也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什么是相对过剩？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所谓有支付能力就是有货币，货币加需要就是需求，只是有需要而没有货币，那就纯粹是一个需要。现在

由于两极分化，高端的富人很少，穷人很多，穷人有绝对的需要，但那仅是需要，它并没有货币支撑。因此现在私人品方面存在的也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现在很多行业、很多领域到处都是相对过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的局面？主要缘于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30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导向。它的特征是短缺经济。为什么短缺？因为它是有限的产出面对无限的需要，它面对的不是需求，所以它永远都是短缺。当年第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蒲鲁东曾经说过，公有制是弱者剥削强者，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改革前的30年是弱者剥削强者，大家没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偷懒的人剥削了勤快的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总体上是资本导向的发展，资本导向就是大家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特点就是效率优先，结果就是强者剥削弱者，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以后就导致现在的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未来的调整，总的方向是共产主义导向的再改革。现在需要再改革，怎么再改革？就是要调节需要和需求。需要，那大家都有，但是不能全部都满足，要调节这个需要，要将其转化为合理的需求，就是要规模可控、结构可调的把它转换成合理需求；同时也要调节供给产出，那就要按照资本导向原则高效率增加供给满足需求。这样就可使供需，即供给和需要、需求三者达到均衡。我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导向，就在于它是按需分配，调节了需要和需求，所以它不叫社会主义导向，也不是资本主义导向。资本主义导向效率很高，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导向则没效率，吃大锅饭。上面讲的是悖论及原因，下面讲优化。首先要调整分配结构，把需要转变成需求，但是要规模可控，结构可调。第二调整产业结

构，增加公共品、创新品的供给，刚才讲这两样都是严重不足。第三调整整个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向共产主义导向的。总之要对症下药，私人品就要激活需求，对市场供给过剩的，要在结构可调、规模可控前提下增发货币创造需求。如果规模不控那就会多发货币导致通胀。公共品要大力补足短板，大量增加产出。创新品也要尽量增加。现在对创新已经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实际上没有必要提那么高，真正的创新要走在前面，走在前面风险非常大，创新的成本很高。我们一看有人成功了就紧跟上去最好，但这样美国人会骂你是在搭便车。第四就是宏观政策调整，我们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动。怎么联动呢？就是联动发行货币调节需求。刚才讲需求就是有货币支撑的需要，所以要变需要为需求就要给它货币，就是要天上掉馅饼。经济学家常讲天上不能掉馅饼，我说的就是要掉馅饼。现在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天上掉馅饼，美国的过度消费经济就是天上掉馅饼，美联储发货币贷款给消费者，零首付让他去消费，国内产出满足不了，还要中国的出口，这样也带动了美国经济，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货币政策要扩张。第二财政政策也要大力扩张，更要结构调整，重点关注和支持医疗、教育、文化、生态环境领域。最重要的关键是要财政和银行联动发行货币。我们原来的货币发行渠道都是供给导向的，就是生产厂商预测下年需求大，就增加投资，然后向银行贷款，银行再向央行再贷款，这是生产供给方导向的货币发行。问题是预测不一定准，准了呢大家皆大欢喜，归还贷款。不准就存货积压变成坏账。现在要将这种生产供给导向改变成消费需求导向的路线。比如说医疗需求大，全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给10

个亿建三甲医院，那就是2万多亿，2万多亿钱从哪儿来，财政给。财政不够就向央行发债，实际上是缺口是央行给，央行发行货币。财政给各县2万多亿后，谁都知道这2万多亿的医院需求是有真实货币支撑的，扩大产出决不会失误。它第一轮带动的是房地产，医疗、教育房地产。第二个能带动的医疗设备、教学设备，第三个带动就业，医生、护士、教师等等，这样就把整个产业结构转过来了。这样就将原来是单一唯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成共产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社会、文化、医疗、教育、生态环境全面的发展，这才真正叫转结构或调结构。现在调结构普遍不知往哪里调，我的意见就是要从单一经济维度的增长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转。这样转必须要有货币和财政联动支持，形成有货币支撑的需求。但这个需求规模一定要可控，规模可控在哪里？过多的转换会通货膨胀，过少会紧缩。所以我一再强调要规模可控、结构可调。要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动，通过国家的财政和政策性银行来推动和实施，现在商业银行不缺，私人银行不缺，缺的是政策性银行。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导向再改革，还需要医院、学校等微观主题配套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原来的事业单位要么是政府包办，没有产出能力、没有效率，要么就变成市场化、企业化，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结果就导致优质产出严重不足，劣质产出甚至坑蒙拐骗层出不穷。当然，现在供给丰富甚至过剩也是资本导向的贡献，对此要充分肯定，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共产主义再改革，要把它优化，但决不是要把它取消。对资本要鼓励也要节制，孙中山也讲到要节制资本。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前面是学者们的观点，我关心

的问题是制造业又逢春天还是怎么样？讲三个方面，一个热词，最近热的是什么东西。第二是问题，第三是观点。

热词我分了四个部分，第一，政府的热词。政府的热词是一路一带、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南北车合并，这是政府主导下的词，实际上一句话——国家战略。跟制造业有关的国家战略。第二，博鳌的热词也很多。亚投行，东盟国家的产业区，还有传统产业转型和转移，还有技术积累，这是博鳌的热词。第三，是产业热词。现在媒体上经常会讲这些，外资的产业转移啊，外移啊，日本三洋退出历史舞台，日本多家家电巨人的问题。我们选择的热词，包括跟我们的客户讨论比较多的，是产业组织方式变化和金融资本注入产业资本。

问题是中国制造业现在的状况不好，前面学者们也都讲到了一些问题，原因很多，这些原因大家刚才也分析了，有必然性也有世界经济景气度不够各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制造业要度过这个难关，实际上中国制造业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人口总量来说，就像刚才讲的最后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我们在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结构性就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制造业陷入了崩塌式的萎缩，特别是对一些加工业，还有退出成本过高的问题，以及社会信心不足等问题。

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的重整光靠举国机制、南北车模式来提振，或者过度强调互联网+模式，或者期待工业 4.0 能在短期内提振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低端意味着弱者，而互联网+模式是强者的游戏。谁制定规则？关键在这儿。第二，中国高铁产业链的打造是举国机

制下国家投入巨资形成的，如果没有中国近万公里快速铁路高成本的超前投资建设，这个行业的国际地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指望国家主导来打造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在这里面国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中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第三，中国制造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它强在在配套能力比较强，当然是低端的配套。它弱在加工业仰人鼻息，自我升级能力本来就严重不足，再加上过去年份整个的实业融资加上市场投机跨界式的发展模式盛行，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非常虚弱，在丛林法则下不要说转型升级，能够自保就不容易了。而且这个自保是有条件的，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有相当一部分融资是靠互保的方式来做的，如果倒核心企业一倒就要倒一大片。如果它不能自保，就要影响就业，影响社会安宁，影响公众对制造业乃至对经济的信心。第四，如果政府的政策应对和社会自然配置方式，只是关注热词而不真正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部分以加工业为特征的制造业可能会断崖式的崩盘，而且可以是连锁反应，这个是挺可怕的。

第三部分是我们的观点，就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的组织方式、市场竞争环境、资源配置导向需要进行深化改革。我们一直在讲深化改革，从哪里深化，我们有这样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从政策上支持部分问题行业的产业政策，多年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这些企业或者这些行业，当它有问题的时候政府实际上有义务去帮助，当然不是保护落后，这是一个。第二，大量行业性组织的去行政化，真正回归行会本质，重建市场规则，这样包括强调行业自律、强调同业之间共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三，政府应该委托第三方或者市场中介机构拿出行业的对策，因为现在我

们看到都是非常粗的前瞻性、未来性的东西，但是具体的、行业性的对策很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一些地方政府不敢有所作为，也不知道怎么做。第四，要鼓励行业内居于产业链高端的领先企业通过并购来提升行业竞争力，在改变产业组织方式的基础上转型升级。一方面是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是滤掉多余产业，形成有效的重组产业链。第五，建立行业振兴引导基金。政府应该与市场力量共同以金融方式支持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我觉得政府是责无旁贷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现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应该这样做，一路一带也好，东盟的产业园区也好。些东西如果要一家企业去面对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大量的往外走的企业，在越南在哪里出现问题很难得到保护。所以就是应该把这些东西管理起来。第六，对有能力的行业和企业给予产能结合的支持，要促进行业竞争力的重建，产业组织方式的升级，因为产能结合是对实体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中国制造业的春天真的能再次到来。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我的题目是谈谈产业和企业的问题。新常态背景下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问题。我就从趋势和底牌说起。这个趋势我觉得有大趋势和小趋势，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大概念上的趋势刚刚讲过，所谓的金融化、市场化或者是园区化。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小趋势说清楚，因为全球趋势、中国趋势乃至产业行业趋势乃至企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要区分开来。我觉得趋势背后的底牌是国家利益问题，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民众利益问题，它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全球环境下国家之间的博弈。比如中国出台“一路一带”，实际上从地缘政治上说是想争取

话语权，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现在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的，就是说中国做事没有规矩。中国后续真正在实际运作当中如何遵守规定，如何以自己的能力改变现有的规矩，我觉得这恐怕是考验。最后是核心利益问题，国家利益问题。至于国内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民众福利，它的底牌就是你的执政能力，最终是人心向背。我想就你这个题目做一个解读，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当然中国经济自身的大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提的新常态。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新常态在全球话语背景下和中国话语的背景下有不同含义。因为2009年提出新常态概念以后，他说指的是危机后的低增长高失业的萧条调整。中国所提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借用了这个概念，自己的定义就是说中高速，就是说调结构，就是说稳增长。因为我们的速度至少是在7。当然印度速度更快，我觉得在金砖五国里印度经济上来值得我们关注。原来我们讨论中印最大的体制差异就是金融，印度的整个金融体系现基本上是市场化的，所以我觉得这值得我们予以研究。去年12月11号，总书记举了九大特征，我觉得这个九大特征的背后就中国能不能保持增长，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保证整个民众收益的改善，我觉得这是核心底牌。

在认清这个大趋势下我想进一步说小趋势。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所谓小趋势我想从产业和企业来说，除了习总书记归纳的九个特征，我觉得产业的小趋势上有几个问题。原来发现有落差我们就马上把它引进来，今天的开放内容已经进入到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比如说金融体系本身，我觉得这恐怕是有挑战的。所以这是一个转变，从市场换技术资金管理的外延式成长转向内生性的成长。

第二个变化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出口与内需并行的驱动。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整个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的战略模式，从出口导向的驱动转向出口与内需并行的驱动。今天李克强总理自己做营销员，把高铁推销出去。实际上出口还是少不了，特别是消化我们自身的过剩产能，包括今天的一路一带，水泥啊钢铁啊这是最主要的。在整个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欧洲出了问题，我们现在低端的出口现在几乎已经被越南、土耳其等五个国家取代了，所以你今天必须要走向产业升级，这是逼着你的。

第三个变化就是从依赖资源环境要素的增长转向科技制度创新的增长。今天习大大在上海已经说了，你要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现在也炒得蛮厉害的，究竟这个要义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人说，今天上海就已经是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了，有380多家世界500强总部在这里，有250家左右世界500强的研发机构，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最近看了写以色列的《创业的国度》和写瑞士的《创新的国度》这两本书。上海现在可以说拿得出去的东西不多，微信上不是流传一个深圳和上海打牌的段子吗。所以我认为上海要建成科技中心，要打破四个围墙。第一个围墙就是跨国公司发展与上海经济之间的围墙，特别是它的研发中心的辐射效应，它的研发中心的带动效应与上海经济的关联度，要打破围墙。今天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完全是服从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需要的，它是利用了上海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因为中国人很聪明，然后用了你上海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包括廉价的办公场所。第二个是要打破国内有影响的企业与上海经济之间的围墙，比如说腾讯在上海有2000—3000人，它跟上海经济什么关

系啊？它同样是用上海的劳动力，上海的环境，上海的土地和办公条件，但是它的研发成果服从于总部对项目的规划安排。第三个围墙就是中央机构与上海经济之间关系的围墙，比如说许多部属大企业，211的，985的，我们复旦大学和杨浦区有一个区校共建还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说，整个围墙还是很明显。第四个围墙就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围墙。科委跟经信委是什么关系？今天我们上海的一些企业就是在政府的一些基金里面打圈圈，始终要政府的这个钱，实质性东西拿出来了没有？

第四个变化就是从数量的优势的人口红利获取驱动转向质量竞争优势的驱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对上海的考验。这是小趋势本身的问题。我想说的最后一个观点就是企业的底牌，是企业自身的生存竞争，它的环境也变了，它整个的生存支撑的技术条件也变了。商务模式乃至企业文化都是企业经营当中很重要的基础条件，我们要改变过去在技术理解上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常识上的东西要改变。最后的企业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底线支撑的，一个是法制保障问题，这是对企业家理性的尊重和保护问题。由此关联的第二个底线就是企业家心理问题，他对未来有期望，如果他的期望是受到保护的，他一定会找到转型升级的办法，如果他的期望是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他一定就移民了。

潘滨（高风咨询）：因为我们是做管理咨询的，所以宏观的趋势我们研究的稍微少一点，微观的多一点。刚才王总说接地气，那就自下而上给大家提供一些企业对这种所谓新趋势、新常态的看法。主要来自我们接触的一些客户。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跟不同的企业来谈这个问题，包括

外企，包括很多的民企、国企。在企业这个层面，大家的意见非常的不同，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接触的客户有几类，一类是做传统行业的，例如钢铁、水泥。这一类的企业确实感到现在形势的压力大一点，一带一路的提法对于整个产能过剩和解决的程度到底是多少，整个业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一类客户的前景会比较谨慎。从最近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最近石油价格跌的比较厉害的话，中国三桶油会大幅降低今年到明年的资本支出，那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些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一个看法。

但我们很多在新经济的领域里的客户，他们现在找我们做的最多的项目就是如何能够把增长从 50% 变成 150%，对他们来讲整个中国的新经济领域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管理的能力，所以找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对新经济、新常态，我觉得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第一点。

我们另外一类客户是做海外投资的，这一类的客户也觉得海外的机会非常多，关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钱投了以后怎么去管理的问题。所以找我们主要做很多这方面的，比如说组织架构、管控模式等。

另外有一些客户我觉得是属于民企，他们觉得所谓的经济的新常态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弯道超车的机会。相对来讲，我们国企过去在这种核心能力上的建设比较滞后，一旦整个宏观经济开始出现一些萎缩，对他们的压力马上就显现出来。所以这是另外一组客户的看法。

刚才大家提的很多的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行业，比如说传统的制造业等等。这一类企业确实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一些新的经济领域，包括互联

网，包括互联网金融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包括生命科学，包括一些环保，包括在上海做的项目（一家跨国企业给消费者提供动物蛋白质），他们都觉得在这方面中国的机会太大了，因为整个消费的升级，包括消费者对于生活质量的新要求等等。

还有一类是做消费品的，是做90后和年轻一代消费品的企业，他们都觉得中国的机会太大了。你去跟他们谈新常态的话，他们可能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不相关的，对他们来讲90后的这种需求简直就是一个宝藏。通过手机的社交媒体，把虚拟的转成实际的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在谈整个中国经济的趋势，我没有做系统的准备，从我个人过去1—2年接触企业的感觉，只是简单下一个结论。我觉得在整个大的所谓新常态的定义下面，如果我们看一些微观的行业以及企业的话，我觉得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活跃、非常欣欣向荣的阶段。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新常态的话，我觉得那种新常态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极高速增长，然后是要通过组织的完善来驾驭这种高速增长。未来如何更好利用这种资本，如何利用中国跟国际的结合，我觉得他们的机会是无穷的。我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吧。

王德培：你的发言成了赤橙青黄红蓝紫，这7种颜色有了。刚才7位专家有悖论，有矛盾，有趋势，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前景，这个蛮好的。上次预备会议各位与会者反复强调了，我们挑头的这次也很辛苦，穿针引线，挑头搞了一个民间脑库，希望能够秉承圆桌的平等性、互动性、效率性。这场我做轮值主席，我对发言时间

非常严格，不管你是谁，就是掐秒表，到时间就结束。下面休息 15 分钟。

下半场：与会者的互动讨论

柴俊勇（上海市政协）：从生产力主线来看，它从 50 年代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开始走过了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期，这个已经结束了。到了里根时代经过了几轮滞涨，然后到了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需要找市场，中国需要开放市场。这么一来，从 2003 年中国加入 WTO，由于中国的体量大，又延续到了 2012 年将近十年左右。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这么一来，还要再走八到十年，在新能源、新材料和其它一些新兴技术如互联网+，才能走出新的低谷。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短的。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制度创新是解决一切创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组织运行体制都包含在里面。相对来说，西方国家他们在互动，不断地在调整，现在出现的一个迹象就是互联网经济是个分享经济，所有这些问题的底牌是市场模式的调整问题，欧洲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福利经济，美国也遇到了麻烦，中国现在是分享经济，分享经济有一个理念，包括我们现在的众创形式，包括个性化消费，所有我觉得中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找准了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路径，中国下面许多问题就可以破解了。

我的观点刚才说的，现在说下行我是持不同看法的。任

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直往上的，马克思早就讲过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式上升的，它的下行再上升是必然的规律，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来四个全面，其中一个全面是奔小康。现在我们还有一亿人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上，这一亿人在五年之内能不能解决贫困，关键是解决就业。所以提出万众创业，所以就业问题还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过去我们定指标是怎么定的呢？是以发展速度来定我们的就业指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一百万人就业。从去年开始变化了。怎么变化了呢？现在是按就业的人数来安排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大量增加，去年的就业人数达到1300万人，超出我们的预料。今年的发展速度定在7%，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啊？你看现在的快递等等的服务业要增加多少就业人数啊。再有，我们工商登记注册制改革以后，一个人的公司大量涌现，每天增加很多很多公司，增加了许多就业人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府怎么来帮助企业。现在我们的许多政府官员不了解企业，不接地气。比如说2万元不到的小企业可以免税。2万元不到是什么概念啊，去掉各种开支成本，连一个民工的收入都不到，怎么创新呢？我的观点是现在的政府要大力支持企业，我在政协开会的时候讲过，我说现在企业面对政府四扇门，第一是玻璃门，政策看得见摸不着；第二个是弹簧门，一过去就弹回来；第三是旋转门，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第四是卷帘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我讲了这四扇门，哗，掌声雷动。我们国家的政府一定要为企业服务，企业起来了，经济就上去了。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你说到政府的服务啊，

政府的服务最最重要的是拆庙。因为有机构在那里，有人在那里，他就要想办法做事嘛，所以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大范围精简，把这笔预算省出来用于民生。

王德培（福卡智库）：我在网上有人微博给我发帖、建议，很简单，政府部门24小时上班，裁掉三分之二的人。弄出来的钱给老百姓。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觉得很对，政府要为企业服务。我具体再说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出去，应该要学香港帮助企业走出去。还有一个，美国专门有一个中小企业的机构，帮助中小企业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说，第一，政府可以直接出面，或者可以委托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可以给一点资金支持，包括买服务支持。还有一条，我前两年到安徽去看过一个工厂，它做的东西很普通的，就是饭店里面自助餐的金属盛器。后来他请了一位德国退休的专家来帮他们，弄得非常好，这样花钱也不多。所以，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基金，贴他三分之一的工资或者所得税，减少一点企业的负担。所以财政政策在2015年还要弄。我再说几个东西，比如说计划生育费就不要向企业收了。还有一个你们可能不大知道，像我们这个基金会，如果这一年我钱多了，还要缴20%的企业所得税，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他们到欧洲、美国全去考察过，没有的。因为你本身是非盈利的，你怎么还要去收所得税呢？我们到上面去讲了好多年没用。

王德培（福卡智库）：你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说劳动力是供不应求的。如果你认为三五年以后劳动力会供不应求的话，这对于国策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判断。你指的是人口的出生率较低，还是指未来产业的劳动力稀缺？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从15岁到59岁，按照国际标准是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已经是负的了，以后每年都是负的，2013、2014都是负的。

王德培（福卡智库）：另外有一种假设，我们争论一下。随着202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达到临界，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它用的人越是少，大量的劳动力被抛出来。那么他刚才讲的那一类企业，今后一般来说是轻架构企业，轻架构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很少的。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刚才讲到我们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在增加，但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是多的，它的劳动生产率不如第二产业的，所以它会拖慢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就业会增加很多。再加上政府鼓励创业，什么没有门槛啊、资金支持啊，也能解决一部分就业。我们把就业的弹性在模型里面考虑进去，所以再怎么讲，你要确定经济增长率不应该再看劳动力了，应该看你企业是不是能够盈利。以前是为了维稳，哪怕投资再大也要保证就业，要保持社会稳定。

王德培（福卡智库）：你的前提是供不应求，所以不要那种考核。我看到经信委有一个指标，它说未来五年，5000万的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将减少70%，什么道理？这五年是中国机器人增长最快的五年，那么这些人一出来就是3500万。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我觉得中国的产业要是用机器人，它现在的盈利空间还能够接受。问题是现在大量的加工业如果引入设备，企业会跟着向人力成本和综合成本低的地方跑，所以大量沿海企业会往中西部转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业本身的附加值，就是因为大家由于丛林法则、

互相杀价竞争，把盈利空间打到非常非常低了。总体上来讲，很多行业中国很占优势，问题是毛利空间很低。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靠机器人是解决不了的。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再补充一点，为什么我讲形态？我一直在脑子里想，不可能是平均的。最近我们接了一个课题，在山东一个落后地区待了几天，我们看了很多工厂，上海不要的东西，什么纺纱锭啊，那边照样在做，因为它那里劳动力成本低，所以我说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国家那么大，差距很大。我当然支持一些领先的企业，作为国家队要去做，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传统工业。我们的城镇化的政策还是有一点问题，我们强调就地城镇化，你怎么来解决呢？你就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嘛。我们现在限制还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到县市去，3天，每个市长书记局长都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尽最大可能帮他们做得客观一点。他们那里是一个人口导出的地区，户籍人口120万，常住人口100万，人是往外走的。

柴俊勇（上海市政协）：我们看问题讨论问题一定不能忘记我们的国情。我把我们的国情概括为四句话，第一个叫历史包袱重，到现在封建残余还在，反封建是做得不够的。第二个是消费没保障。这次春节出去一下子把人家日本搞得吃不消了。第三个是区域差异大。第四个，上下走样。我们从上往下布置任务，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从下往上报数字，层层掺水、水到渠成。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出口不行，出口退税，然后说都可以报，下面就报上去了。所以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考虑国情。

王德培（福卡智库）：你讲到国情我再请教一下。你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奢侈品的问题，奢侈品实际上涉

及到三种税，但整个国家的财税的架构中，海关税要占三分之一，现在自贸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海关的关税问题。考虑到国情，财政上捉襟见肘现在越来越厉害，你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海关税一块一块地剁了，有没有这个可行性？我和有关人员探讨过，把奢侈品税弄得像香港一样大家扯平，那么其中一大批人就可以不要出去了，但是海关税占我们国家的税收有三分之一啦，国家近期会不会允许你在关税问题上这么做呢？国际上现在市场经济也逼着你零关税，但是三分之一与零关税之间的距离是很伤脑筋的。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你讲的问题很对。我的建议并不是说什么关税都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是针对奢侈品，这个可以讲。而且我们现在要加大财政政策的改革，财政政策要减税收，那么你所得税能弄吗？弄不了，很麻烦。说搞综合税，说了20年了，综合税也没有搞起来。其它还可以做什么东西？没法做。为什么？我看过一个报告，非常有道理。亚行有一个报告，因为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包袱是比较重的，其实这方面有一部分要中央拿过去。为什么？中央有一些权益是地方政府没有的。讲得难听一点，你通货膨胀，多发一点货币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当然这个话是不能公开讲的，这个也是有争议的。货币发得多，M2是不是一个标准？我们也在讨论，M2不应该是一个标准，这有很多道理，国外已经不拿M2作为一个标准了。为什么现在M2那么大也没有看到通货膨胀呢？物价还在往下走嘛。奢侈品税解决以后，国内有很多地方能够解决问题，你的就业能够增加，而且其它地方的税收可以收过来了，你的营业税、所得税可以增加，工人就业增加了嘛。你的关税少了，其它税可以增加的，不是全部没有了。我在

这里顺便提出一个概念，是一个今后我们可以做的课题，要做的很细，每一类关税要细分，每个行业都要有具体的数字拿出来，然后再来作比较。我们不知道现在工信部、发改委有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目标定出来了，也很好，十个产业，问题是怎么到那十个产业？路径是什么？

王德培（福卡智库）：他是讲大思路的，三个十年，三十年。第一个到2025年。现在有些专家这么说的，凡是国家出面来搞产业结构调整，搞到哪里死到哪里。现在你又要搞，是不是又要把它搞死了呢？或者说你会不会兑现你的规划目标？因为路子已经变了。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而且国家队太强大，又将是一轮国进民退。

沈晗耀（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我接着你刚才讲的货币到底是不是M2。我前一阶段作了一点研究，现在的M2主要是指银行系统的货币，除了银行系统的货币以外，新的系统我发现是资本市场。今年的M2中国是120万亿，前年在97万亿的时候，大家就讲中国是第一货币发行大国，超过美国，美国是五六十万亿。这是指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加上银行系统的货币。流通货币是M0，流通货币加上短期存款叫M1，再加上长期的存款储备叫M2。一般讲是两块系统，一块是社会流通，一块是银行系统。实际上还有很大一块钱在资本市场。按照这个全口径，美国两年前的货币是450万亿。我把它说成是M3，就是M2加上资本市场的货币，叫做M3。同口径我们当年M2是90几万亿。加上我们的资本市场当年是30来万亿，再加上债券，我们整个M3是150万亿不到。美国的M3口径是450万亿。我们现

在整个 GDP 现在是 63.64 万亿，那一年才 50 几万亿。我们是 140 多万亿带动了五六十万亿的 GDP，美国是 450 万亿带动 100 万亿（人民币计算），总体上是差不多，都是一比三左右，我们是一比三不到，美国是一比四多点，效率大家都基本上差不多的。还有美国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他推出了多轮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实际上多次都没有效果。甚至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基础货币大于 M1，基础货币就是流通货币加上存款准备金。一般情况下是 M1 大于基础货币，那几年央行基础货币发出去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贷不出去又退回到央行变成准备金。还有商业银行被动地留在它自身那儿，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不投资不贷款。但是另外一块资本市场的货币创造机制很好，当时股市是 8000 点，现在已经到了 16000-17000 点了。这一块增长得很快。所以它这几年的经济复苏是靠资本市场的高速增长。它的货币发行在资本市场发行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中国原来也是只有 M2，最近也开始到资本市场了，现在中国股市已经 38.9 万亿的市值了，再加上债券，我估计现在的资本市场货币已经有六七十万亿的货币了。所以我把资本市场的发债和发证券也当作广义的货币来看的话，这样就好理解这个问题了。因此我讲到多发一点货币现在在中国是没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金融通缩的问题，由于现在 PPT 连续下降，CPI 也不高，这个就说明对经济前景不看好，不看好再发货币也不行，所以要找一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在哪里呢？要解决经济危机靠什么？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解决了美国 1929 年到 1933 年的金融危机。二战打完了以后，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起来？也是靠朝鲜战争，需求是这样打出来的。为什么战争会解决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呢？它可以突然

爆发出来一个规模巨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创造了以后，所以美国成了世界第一的大国。然后战后搞了一个马歇尔计划，战后它没有需求了，它要创造需求，马歇尔计划就是送钱，送了150亿美金给了德国、英国、法国等等，战胜国、战败国它都给，这些钱反过来买美国的工业品，于是美元出去变成欧洲美元，变成了国际货币。过两年在中东买石油，又形成了石油美元。再加上东亚、及后来的中国出口，又形成了外贸出口美元，使美国货币变成了世界货币。为什么我们经济前几年高速增长，美国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但那是恐怖平衡，就是美国央行无限制发货币，让美国人消费，它消费品不够，中国、东亚给它出口。这样就带动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本来中国的货币发行是供给导向的，发给生产性企业，现在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外币占款，出口一亿美金的货物，要六、七亿人民币来兑换，一兑换就形成国内货币很多。货币很多了需求就很旺盛。现在美国的发动机突然不发货币了，那么就需要中国就来发货币了，中国央行可以发给自己的短板，比如优质医院、优质教育、优质的文化企业、优质环保企业，这个是向财政发，向政策银行发，发国家开发银行发，不是向商业银行发。比如说假设全国有2000个县，每个县建一个三级医院，每个医院给它10个亿，每个县再建一个大学，2000个大学。房地产原来是搞住宅地产，后来是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现在就搞医疗、健康、大学、社会事业地产。同时我再搞一个政策性银行，社会开发银行，专门支持社会事业发展。上一轮的四万亿是搞了基础设施建设，搞了铁公鸡，这一次铁公鸡搞得差不多了，还要进一步完善。现在我如果搞医院、学校、文化娱乐、体育这种设施，这种设施搞好以后，就是功能性开发。比如说浦东开

发，第一轮就是盖房子，盖房子以后就要搞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从单一经济转向全面发展，向医疗、教育、健康、文化、生态这几个方向发展，但是这几个方向是属于公共性的，利润没有或者比较薄，那就要靠公共支出，靠央行发货币来引导私人提供医院建设，提供医疗设备，提供教育设备。另外下边的微观主体改造应该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第一个改革重点是企业经济改革。第二个改革重点是社会事业改革，不能把社会事业改成企业化，唯利是图，同时也不能靠政府供给，否则就没有效率了。要改成社团，要放开社团的组织登记。企业改革以后的主战场应该是事业单位改革，这个改完了以后，社会稳定了，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我觉得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99%，就是社会事业没有完成。我的结论就是下一轮发展要战略方向转移，从单一经济转向全面发展的方向，这是短板。第二，社会事业改革要成为改革的主战场。宏观上一定要有中央的货币发行政策转变。

李放（远卓管理顾问）：最近我在地方融资平台在做一些项目，现在问题是前一轮地方性的公共事业的建设实际上出现过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钱融下去了，下去以后没有人认为这是要还的，任何一个东西不考虑它的投资回报，钱一用就完了，这就带来了大量的银行贷款没有还贷。财政的钱能够把它的收支打打平就很好了。带来的问题是开发银行下去的钱没有任何回报。所以如果那些所谓的非盈利机构没有投资回报能力，往下扔的钱越多，问题越大。

沈晗耀（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我回应一下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 63.64 万亿 GDP，我们的财政收入是 14 万亿，我们的 M2 是 120 万亿，也就是说，120 万亿带来了

将近一半的产出。也就是说8元5到9元的货币发行带动一元的税收。我建议从现在开始，3年发5万亿，是向中央财政发，可以带动财政收入。有了钱它建立医院，要施工单位，要医疗设备，这些起来了，8.5元就带动了1元的财政收入。就等于2万亿发出去可以带动1万亿的GDP，1万多亿可以带动2000多亿的产出，税收就可以来还你这个钱。第二，更主要的是要把那些事业单位变成有收入能力的单位，医院不能变成一个福利组织，它变成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但非盈利不能不赚钱，就是盈利不给老板分红，就投资的资本所有者不分红。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性的组织，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基础，所以要大力发展医院、学校、文化体育事业、以及各种协会。提供资金的人是不能从里面分红的，机构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可以归还贷款。还有，我们的投入本身，不能全部是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消费，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吃掉就吃掉了，是不应再回收的。所以讲我们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一部分医院、学校的钱就是无偿的，就是消费掉了。

王德培（福卡智库）：换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很复杂。但是我们的脑库，学术界也好、政界也好，过去政界都在推导模式。美国人认为它的模式是好的，中国人说自己的模式好，中国世纪这种言论从2015年开始出现了。既然社会是多元化的，我们的理论研究实际上也应该是针对这个多元化的，而不是线性的、去追寻单一模式的思维方式。这是我先讲一个立论。另外最近那位鼓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老兄他提出来的观点与他一样，社会主义。但是他是从互联网的角度提出来的，他有一本新书叫做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他说互联网发展下去就是物联网。物联网最

大的特点就是信息对称，信息对称了边际效益就趋于零了，生产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什么三D打印机等等扯在一起。而且他给了一个30年，说30年以后这样的社会就降临到了人类头上了。那么资本主义也好，什么主义也好，消费极端主义也好，所有这些的矛盾都将解决。我发现他也算是美国能够预测未来的一派，就像托夫勒一样，至少比福山好，那个日裔的福山他认为历史终结到美国，他是属于上一代人。我们福卡这两年研究了五个市场经济，什么是五个市场经济呢？就是自由的原教旨的市场经济，那是一种，估计我们到2020年有实质性的变化。国家市场经济，由国家出面的也算是一类。国家出面的包括我们15.5万家国有企业，现在3600万职工，104万亿的国有资产，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这种势头我估计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它的存在理由。美国人现在是玩潜规则，国家市场经济玩的也风生水起，三一重工进不去，华为进不去，这个也是它的。全世界我观察下来，简而言之就这两个国家最狡猾，玩的很好。好多其他国家，像欧洲人为什么从2008年拖到今天才想通了要去搞量化，它就是没有从国家市场经济角度去做这件事情。另外是世界市场经济，TTP之类的。第四个我们研究的是平民的市场经济。就是今天你刚才在讲两个创，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它是逐渐逐渐逼近的。第五个是社会性的市场经济，我们也做课题，就在一个县你怎么要它产业结构和谐，社会的方方面面安全和谐。所以实际上对我们国家至少要有五个市场经济的建设，而不是过去单一的一种思维。单一思维你解决不了，完全按自由市场经济好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我就讲一个社会主义的案例，我并不是你刚才的调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你为

了抢夺眼球。

（插话：我讲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就是按需要来调节，这个是属于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是叫按劳分配的。资本主义当然是按资分配，我们现在按需要分配，但是前提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现在什么叫极大丰富，卖不掉，过剩，这不极大丰富嘛，所以是共产主义）

王德培：我刚才讲的是多元化的世界，我现在再讲一元化的世界，我讲的一元是要强调，真的是讲社会主义。有的时候普罗大众也骂我，说我是党中央的高级马屁精。实际上我是有研究的，什么道理呢？现在的核心价值观 24 个字，没有人记得住，一方面发散度不够，另一方面收敛度不够。我们福卡前几年跑到市委党校，那个校长和我讲，你也要用 6 个字，你讲清楚核心价值观。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就这 6 个字，我们真的是经过研究的，我说“社会、公正、协调”。实际上这个核心价值观国内也一样，世界也一样。我刚才举了美国的那个社会和中国的社会，那你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社会？把他那个言论延伸扩展，真的，这个社会全世界都需要。

（插话：我最近刚到美国去旅游了一次，去看了两个老朋友，他们跟我讲两个事情，我是感慨万分。你说美国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但这两个例子一听好像它有点社会主义成分了。我看的一对夫妻，上海人，都是搞医学研究的，都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退休了。先生得了帕金森症很厉害，差不多已经不能走路了，一个月的药费 7000 美元，他的太太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但是因为照顾他以后从楼梯上摔了一跤，脚跌坏了，太太干脆请长病假了。这样这对夫妻都没有收入了，马上先生的 7000 药费给全免了。第二，他们跟我

讲美国的小孩从出生开始上学一直上到高中不要钱，然后州立大学一年 5000—6000 美金足够了，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绝对是平等的。这两个例子我一听还是蛮感慨的，社会主义啊，这是平等啊）

（插话：你去看越南，越南小孩的医疗不要钱的，越南很穷啊，这还是一个政策问题）

（插话：现在说国内要消费拉动，现在老百姓当然消费能力很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是很不全的，我们现在讲社会保障还真停留在养老保险，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那你要讲到医疗呢，教育呢，现在老百姓最大的问题孩子将来读书的钱要准备好，老了生病的钱要准备好，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插话：实际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改革开放以后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但是西方、欧美它已经很多是社会主义因素。我非常佩服北欧的几个国家，因为北欧是第二国际执政的，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建立的，第一国际是马克思建立的，后来马克思慢慢战胜他，第二国际恩格斯搞了以后就不再搞暴动，要合法斗争，斗争完了主导以后然后实行政策，第一个搞社会保障。）

周禹鹏（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第一是看老朋友，第二确实是想学习学习。尽管我也是一个退休老人了，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再多学一学，很愿意多听听各位的高见。作为民间智库，第一要讲真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三年前我到北京去，每年一次参加论坛，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很民主自由。这些材料就放在在门口，报到后自己拿，进来以后，你看哪儿有空位子你就在哪儿坐下来。他们很客气，我因

为第一次去，第一排是主持人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他们几个主持的客气，让我坐在主持一排的最边上的一个位子。这时候郑新立来了，他是中央研究室副主任正部级，当时没有位子了，我还是这个思维，站起来让一下，边上人一把拉我坐下来，你说，你别动，我们这儿不讲这个，谁来哪有空位子坐哪儿。所以郑新立拿了一支笔看到边上有空位子就坐下来。然后过一会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娟跟着刘延东的，她拿了牌子以后连旁边的位子也没有了，就跑到后面第二排空位子坐下来。当时我还是蛮感慨的，就是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下这种平等的民主的氛围，所以在这种场合下听他们的发言确实我觉得是讲出了真知灼见，这是我的一点体会。第二，我觉得要讲实话。实话是什么概念？就是接地气的。现在我也坦率的讲，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能也不少，但是有时候要怎么样既要有思路、有智慧，还要能够接地气。当然这个东西也不能讲的过头，讲的过头人家又不敢讲话了。但是实事求是讲，能够有更接地气的又有智慧的话那就是更高水平了。所以我也很喜欢听听大家怎么说。你这个题目我是非常赞成，趋势和洗牌，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心中国这个经济势头怎么样，有看空的，有看多的。最近这次博鳌论坛，习近平有一段话，我们中央电视台是由播音员播的，不是习近平的原声，但凤凰台是习近平的原声。习近平在这个博鳌论坛后面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他讲了一段话，我认为讲的非常好，非常有智慧，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话。大体意思，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好的一面，也有很差的一面，有很强的一面，也有很弱的一面。我觉得真的有道理，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经济走势多也好，空也好，总归是一个周期，中国总归有自己的办法。但是现在我觉得

从我接触下来的人，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说下行不可怕，下行还是可控的，怕的是下滑，下滑到哪里都不知道，这个就有点担心了。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至于底线更是很重要的事情，到底在哪里。科技创新啊，大家都在动脑筋，但是这一套东西怎么样变成我们可预见到的效果，确实还有一段周期，有的说二三年，有的说三五年。今年过年的时候，工商银行的董事长和我们几个人聊聊，请他谈谈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看的是比较悲观的，今年不行，明年更不行，他就这么两句话。那么到底怎么来判断，怎么来看？反正我很赞成这个圆桌会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圆桌会议讨论的内容有没有渠道能够宣传？

王德培（福卡智库）：各位，我们今天的发言都会整理出来，原汁原味整理出来再发给各位。媒体的我们也可以给你们，哪一家媒体要发哪一位专家的话，你们和这位专家沟通一下，得到他的授权，如果他允许的话。作为会议第一届的主持主席我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插话：我参加北京的论坛，他们也只是这样的，就是原汁原味地整理，然后有个渠道。我们现在的领导还是很愿意在内部看到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各种不同意见，有助于领导进行决策。）我们可以给市领导，也可以给习大大。作为执行主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下次题目是什么？（讨论后，定下的主题为“2015 金融闯关”）

第2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金融闯关？

2015年4月27日

“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是中国国内多家民间智库于2015年自发建立的学术交流平台。该平台不设立常设机构，每月由各单位轮流主办，就当前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目前加入的民间智库有：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华顿经济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等。其宗旨为“全国的问题，上海的声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声音”。

第2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主题是“金融闯关？”。与会者们探讨了有关金融改革的问题。

上半场：智库代表的观点分享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次有一些人是第一次来参加论坛，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论坛。最近全国搞智库的势头比较旺，前一阵子上海的几个民间机构，或者叫智库，在姜永坤的建议下，大家觉得可以每个月搞一次论坛。我们轮流，第一次是在王德培那里搞的，这次轮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这次的题目是“金融闯关”。这次开会的形式跟上次一样，上次王德培主持得很好，每个人10分钟，到时候绝不留情。这样我们每人发言10分钟，

当中有一个茶歇，然后再讨论。最后，我们像上次一样留点时间讨论，下一次什么时候开，谁来主办，时间、地点，还有开会的形式好不好，如果好的话以后就这么定下来，有更好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上次王德培出了一个题目，我觉得也很好。是不是应该把当前的金融改革称为闯关？如何看待当前的金融改革？我想提出这两个问题。

说“闯关”，是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价格闯关与金融闯关”。简单讲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价格闯关的前因后果。前因是，当时我们国家改革只有10年，1988年时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价格本来是计划经济下定的，当时自然形成了价格双轨制，一个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起了一定作用。这是一个过渡形式，因为一下子改革开放不行。由于双轨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出现价格扭曲，对企业 and 市场发出信号是扭曲的。当时有所谓的调放结合，那时是以放为主，以前是以调为主。

1988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8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全面放开物价。结果价格放开以后，价格大幅上涨，有些地方出现恐慌性的抢购，最后就停下来了。8月30号国务院有个会，做出稳定物价与市场的决定，那个时候以整顿为主。但价格放开还在慢慢做，到1992年底1993年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了。从狭义上讲，闯关不太成功，但是价格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成功的。

当前金融需要有哪些改革？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资本市场改革，主要是股票发行注册制，还有一个是资本

帐户进一步开放，这是当前是要做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比较一下这两项改革。现在的金融改革已经讲了很多时候了，它的渐进性更强。以前的价格改革只有几年就想完成，现在的资本帐户开放讲了差不多20年，也在慢慢做，准备时间也很长。前面我讲到利率市场化，现在差不多除了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其他的市场利率都放开了，所以跟以往的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金融改革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跟全面的价格开放相比，它涉及的面还比较小，特别过去全面价格放开涉及到很多民生商品，容易引起社会恐慌。我不是说金融不重要，而是相比以前全面物价放开，它涉及面比较小。

另外，金融改革需要的后续跟进措施更多一点。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基本上市场就调节了。资本帐户开放以后，如果资本进出波动过大，还要进行后续的跟踪，可以采取更多的一些后续措施，这跟以往的放开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里有一些启示。首先，对我们改革来说，要抓住和突破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过去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前金融改革需要突破的力度。第二，循序渐进和必要的决断要相结合。第三，要做一些预防的准备。可能会出现部分或者局部的不利情况，要准备好补救的措施。特别是资本帐户改革的风险相对其他改革更大一点。

下面我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几个内容简单地作一些判断。

第一，比较有紧迫性。我最近到美国华盛顿参加IMF年会，全球金融方面的专家参加。当时一个小会题目就是“中国跟印度的改革比较”。当时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什么对中国与印度现在最重要？他提了金融改革、公司治理、政治改革、实体经济改革。来的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大家举

手投票，最后的结果是：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占43%，排在第一位。印度是一边倒的实体经济改革，占到86%，包括土地制度、用工制度改革。当然这是一个参考，但至少可以看到外面对中国金融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如果我们再不做金融改革，久拖不决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这能使利率下降，有利于我们实体经济。

第二，人民币今年有可能进入IMF特别提款权。IMF每5年做一个评估，详细情况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也不细讲。我在上海证券报3月17号有一篇文章讲得比较详细。最近报纸上讲得很多，评论也很多，今年中国还是要争取，争取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资本帐户如果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中国，这是5年一次的机会。周小川行长在前不久高层论坛上也讲这可能是一个机遇。另外，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还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2020年建成，都取决于资本帐户的进一步开放，这是有一个紧迫性的。

再看看风险。跟一年以前相比，有些风险可能增加了，因为我们国家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明显。具体我不说了，第一季度指标出来大家都看到。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进行金融改革是会有一些风险，但并不是说经济不好就一定不能做，价格改革最后成功反而是在经济萎缩的时候做成的。

跟去年相比风险减少的部分是，各项金融改革从去年到现在都在进行，基本上我们汇率的干预程度减少了，经常帐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只有2%，这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另外，全球经济复苏也在持续，尽管不是很强，但还是在持续。美联储推出QE引起资金大幅波动的风险已经基本释放，相比较来说，这个风险还是有所下降的。

根据我前面讲的，与价格改革的比较，以及对当前的

迫切性与风险的判断来看，最后我的结论是：第一，我个人支持当前已经或者即将进行的上述的几项金融改革。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把这些改革称为闯关，以免引起负面影响。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我简单说一下，关于闯关这个概念，我就不讨论了，刚刚秘书长已经讲了。我认为整个经济体系，整个市场化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发育不匹配，如果今年放开汇率，放开利率，如果把闯关定位这个东西的话，机制的缺失使得放开利率传导最终很难实现改革的初期目标，会发生扭曲。因为机制缺失，所以金融闯关，按照周小川承诺的，我也看到吴晓灵在第一财经日报上面也说了，我们放开条件是具备的，我认为放开会造成预期效应异化。

首先，我认为金融闯关这个信号已经有所释放。在中国发展论坛3月22号周小川演讲当中讲到！稳健的基调不变。博鳌论坛3月29号，非常规货币政策前景专题讨论环节上，周小川谈到，一方面我们实现了利率的自由化，资金进入股市也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我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利率放开，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放开，汇率可能更敏感一点，所以如果回过头来看，从经济运行当中货币、资金和金融功能做一个再认识，货币资金价值工具作为资源配置当中一个计量和尺度基本功能，它起到资源配置最基准的尺度作用，利率市场化对市场深化有意义。但是在金融体制功能上，与我们整个构造上还存在一定问题，改革进程当中一种金融滞后，或者其他领域，其他环节，其他体系上存在的缺陷应该是看到明显的不匹配，或者机制缺失的存在。

金融配套改革要求跟上，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金融配套先行，工农中建交上市后的改革走在路上，这种改革走在上表现为股权结构、治理结构、银行业开放度，银行业务结构和营收结构，盈利结构，银行业务存量结构并不是完全匹配的，最典型就是股权结构的放开，还是在控制在 25 以下。银行业务存量的服务对象与市场多类主题市场竞争地位关系，为中小企业匹配金融服务所谓“普惠金融”能力没有真正发挥起来。“影子银行”存在的原因。这种影子银行的存在，民营大企业融资一点都不难，主要是企业资本规模，抵押能力，正是因为这个意义上，不少人认为民营企业带矿难款难原因失所有制问题，实际上是企业规模问题。整个市场体系发育存在严重不匹配，市场发育不足，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部门，这种发育不足会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价值始终被扭曲，整个经济结构失衡，今天经济结构与体系发育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开放民营银行才刚刚起步，全社会就批了 5 家，全社会民营银行数量所掌握的金融资源数量有限，城市信用合作社心里有 5 千家，在 5 千家基础上，有的已经很多归并到商业银行中，城市商业银行 112 家，全国城镇银行数量突破 1100 家，第一家批准 5 家民营银行，实际上还只开张了 3 家。调结构的措施目标很难落实，因此我认为硬性要闯关的预期效应会发生异化。

所以这种利率放开，或者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的放开，这种闯关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在改革意义上是有必要的。但是因为体系发育不健全，会导致这种放开应该释放的作为配制资源尺度功能的机制放开所带来的信贷资金的投放覆盖服务对象所产生的种种扭曲，从而造成与其效应的异化。此外，中国老百姓对金融知识普及理解运用能力有限，全社

会金融知识普及落后，使得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走偏，导致股市泡沫化的加剧。实际上人们在股市上并不是以投资、参与治理积极态度参与股市，这种金融开放最终带来新的风险。货币进入股市也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没有显现，显现应该带动资本市场兼并重组，但是实际上抬高估价使得兼并重组更困难。财富效应的虚火进一步加剧诱导民众对实体经济的不关心，实体经济运行更加困难。

所以我的结论是，出路在于继续推进改革深化，下决心开放竞争，放宽金融准入，加快发展民营银行，推进市场体系发育。

具体更重要的是对于国企、对于央企，加快宏观改革的步伐，限制规制二银行的投机行为。从而形成银行金融与实体经济构造之间的体制机制良好互动，整个体系不配套必须把那些滞后的、短板的东西加快改革。好的，谢谢。

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金融改革要闯关。上次讲到，当前既是最好年代，也是最糟年代。当前的突出问题，大多讲是产能过剩，其实这是一个虚假过剩，其实仅是私人品相对过剩，公共品和创新品严重短缺。增加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政府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重心放在教科文卫体等功能性发展。重点是转变货币发行渠道，由供给导向变为需求导向。

金融改革要闯三关，国内转型关、国际开放关和管理体制关。

转型关指要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建立社会发展银行，对教科文卫等给予金融支持。现在传统商业银行只是对工商企业、盈利性企业服务和支撑，对社团组织，对事业单位不

支持。因为像学校资产教育部不准他们抵押，所以商业银行对它很难全方位支持。建议建立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银行。货币发行由原来单向的商业银行一个渠道，另外再加上政策性银行，形成双轨发行。

设立社会发展银行既是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也是金融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我们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单位主要是财政拨款，财政拨款存在一个弊端，项目拿到之前拼命跑部、跑政府，但是拿到钱以后就等于于是无偿了，显然不利于资金有效、持续使用，也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就会出现跑部钱进现象。

我们建议设立的专注于支持教科文卫体等事业发展的社会发展银行，既是专门性的银行，也是综合性的银行，既有商业银行功能，又有政策性银行功能。它是专门性银行，跟原来商业银行有区别。商业银行注重工商局注册的盈利性工商企业，它是注重服务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它是综合性银行，既提供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和中间业务，也提供政策银行拨改贷和拨改股业务。

这个银行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于一身，需要有特殊政策支持。其资金来源有四个，一个是政府专项资金，如拨改贷。第二是吸收公共存款，借鉴商业银行。第三是国内外发行债券，借鉴国家开发行。第四低息、无息向人民银行发债，这实际上是新增一个货币发行渠道。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经济的短板教科文卫体的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它既是金融创新，也是政府用市场化办法管理经济的创新，因此也是行政改革，原来拨款改为贷款后全部都要追踪下去。另外也创新了货币发行机制，

真正支持了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人品和公共品的全面协调发展。

下面讲国际开放关。

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目标要建立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相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中国又是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在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我们的货币要走出去就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政策性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我们建议成立的社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为国际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国家开发银行是服务于国际基础设施及产业建设。社会发展银行就是对文教体育等支持。人民币要走出去，最好是采用两元货币体系来推进，在境内关外的自由港及自贸区发行国际版人民币，仅限关外使用。它与国际货币的关系，是以黄金为基准的自由浮动、自由兑换。与国内货币关系，是以黄金为基准有管理的市场化兑换。建议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发行国际版人民币，香港是境内关外最大的自由港，通过政策性银行，比如说开发行发行，另外中国银行原来就在香港是发钞行，以后也可发行国际版人民币。为了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可以考虑让港币和美国金脱钩，也和黄金挂钩，转换为国际版人民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有境内关外性质的自贸区。我们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行、进出口行，以及总部在上海的金砖银行在自贸区发行国际版人民币，支持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历史一再表明，世界金融中心的建立必然与其本币的国际化进程紧密结合，否则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其英镑的国际化紧密相关，纽约的金融中心进程也是与其美元的全球化节奏紧密相关。而且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无一不是借助于黄金

的支持才得以确立。因此，发行以黄金为基准的国际版人民币对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意义重大。

最后一个管理体制关。建议改革纯金融的一行三会管理体制。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并列，辅助加上国家发改委，再加上国务院研究室或者发展中心等智库，形成两个主驾再加两个辅驾，共同构成一个既互相独立、互相制约，又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国家财政金融委员会，由总理或者副总理来主持。财政部除原有司局外，新增政策银行司，主管政策性银行，人民银行则对其辅助监管。撤销三会，将其职能并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除原有司局外，增设货币银行司，证券投行司，保险司等。这样可使整个经济，尤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筹划和经济运行紧密融合。好的，谢谢！

姜永坤（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融闯关成为一个热词，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当前，金融业的发展改革走到了风口浪尖，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正处在调结构稳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时期，存在着中小企业和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银行业自身资产和负债出现失衡的问题，M1跟M2形成剪刀差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等。

我们还是要从金融改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当前所处的重要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谈。有两点，怎么认识这个金融改革？实际上金融业本身有个特点，有一些过渡的功能，度量、清算、储存到最后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价值，但是金融这个行业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有在跟实体经济结合或融合在一起，它才能形成资本，才能创造价值，甚

至成为经济杠杆。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国家前几年走了一个开放的增量改革，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制，让外资进来，到后来开放民营，一直到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基本上是增量。前段时间主要是内部的改革再造。企业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形成了国有金融垄断的格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前几年的改革还是一个增量改革的内部机制转化，还是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在维护，它的利益很难触动。但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情况，迫切要求银行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银行业自身的改革已经动力不足，但又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儿子，所以最近李总理跑的几乎都是银行。在这个情况下，银行确实是改革下一步，你说闯也罢，不闯也罢，走向真正的市场化、国际化是有道理的，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布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结论就是，现在金融业改革是从机制改革到体制改革，确实是出于非常大的生存需要。这个体制改革一定要破银行的本位利益，想破也罢，不想破也罢，有趋势在推动。

考虑到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金融自身不创造价值。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是一个大金融的思路，应该有大金融战略，目前已经有人提出来，应该有整体规划、产业结构调整 and 系统设计的一个东西。

第二，按照我们国家目前公有制的一些特定机制，下一步银行改革一定要和国企改革结合，产融结合。我们应当利用现在的手段，实行捆绑式的金融和产业的一体化改革，也包括走出去。中央银行和地方银行应划分区域范围，跨区

管辖这种金融机构，应该组合跨区域的一些功能分行，大家划分业务范围。

第三，作为金融业自身，这次闯关不是银行业自身改革的简单问题，思想认识上还要深化怎么破除本位利益。还有就是员工现在在心理上就应该有所准备。实际上到最后一步，利率放开，存款保险最后到位，还有资本项目兑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年的事。还有管理上的水准、素质要全面向国际看齐。中央政府应该现在就要找准专家，设立新的考核指标体系，触动产融结合，一定要去行政化，去权力化。谢谢！

李放（远卓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今天我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这一轮闯关，如果闯得不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跟企业和地方政府接触比较多，我们在央企大量看到，央企最容易的就利用自己的信用，用所谓的供应链金融这一块在走，对他们来讲是低成本、高收益。这对于现在强调的所谓创新、创业，实际上是一种危害。

第二个问题，下一轮走出去的过程中，相关项目又是国进民退的事情。因为这一次国企改革要合并到40家，特别是建筑业、航运业都要合并。现在国企的资产规模本来就已经足够大了，再并上去，当然在国际竞争中也许是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在国内市场，包括带着中国企业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民营经济又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合适机制进行校正的话，这种扭曲可能在下一步可能会放大。比方说，现在我们去杠杆化如果不很好地设置更多规制的方式，实际上不讲国民待

遇，而是讲阶层待遇、规模待遇、身份待遇，这一系列东西会在相当长时期里被大家认为是正常的。规模当然是一个硬道理，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如果规模只是为了去做二银行或者做影子银行的话，或者不停地跨界，就失去了它本来作为国企和作为产业主导的引导性作用，到最后就是虚胖。我认为央企实际上就是虚胖。

我们回过头看前一轮房地产剥离，三产剥离，最后由于利益机制，或者利益集团的较量，你很难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决策上处在被绑架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大来说。

所以，对这一轮所谓的金融闯关，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实际上担忧是很多的。大家现在不知道最后这个闯关到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现在是渐进的，不像闯关，越渐进越看不到方向。在资产泡沫化状态下，实体产业回报不好，我利用我的信用像前一轮那样大家纷纷进入房地产，民营企业也会这样干。大家提了很多建议，当然有一点理想化，当然整体规划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落实的时候。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李总理到处在放狠话，在这种情况下更让人担忧。在这我只能说担忧，不能说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实在看不清什么样的建议是好的，或者说这个建议是可执行、可落实的政策。

王德培（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我说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政策和改革矛盾。现在政策越来越多，政策和改革是迂回曲线，政策多了，改革肯定少。在股票市场方方面面实际上是政策，不是改革。

第二个矛盾是市场经济与国家战略的矛盾。从市场经济

角度讲，刚才几位提的我都赞同，中国远远没有进入到临界，这个还没有越过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临界没有过，所以张晖明提的很多异化和扭曲我完全赞同。

中国现在并行的两条线，对内要市场化的改革，但是又面临一个迂回曲线，国家竞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迫，在国家竞争和紧迫面前，市场化的改革有的时候往往服务于所谓的国家战略意志。因为现在去 WTO 化，世界全球化也到了一个 4 千多点要盘实的过程，在盘实过程中反过来国家竞争是相当厉害。国家竞争一激烈，对内所谓普适意义上的市场改革就要两说了。

第三个宿命和理性的矛盾。为什么说宿命。金融的书我出了三本，在《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这本书里面，我的核心思想就是整个金融业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业已经不是传统经济一般的等价物，它已经自娱自乐，而且自娱自乐又发展到整个回过头来调整各个国与国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它这种宿命是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以及一般的市场企业回避不了的。所以人类理性的那种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是很苍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成功的企业和国家，比如说德国，德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相对比较好，但是从美国和中国来看，现在差不多殊途同归。所以金融业，我实事求是讲，过去土地分配财富，后来工业经济劳动分配财富，再后来是科技创新分配财富，现在真的是金融在重新分配财富。这次无非通过各种渠道又把老百姓的钱要弄到证券市场上，证券市场上他说落到实体经济，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证券市场连赌场都不如，怎么落实到实体经济。所以现在是全方位的，互联网也到了 P2P，也在股票增资这种模式都在开发出来，所以一系列做法金融像旋风一样在各个

阶层，各个行业之间重新分配它的财富，这个过去经济学不太愿意。

这次我在北京先讲几个假设，当前的问题主要是汇率决定的，陈兴动说这个经济看不到底，我当时提了四个假设前提，其中有一个假设前提，我认为对于一个系统来说，不要以为它可以趋向于合理，不存在的，这个地区上各个国家，人类发展到今天从来没有趋向于合理的，今天无论人和自然的关系，还是国与国各种经济关系，有的时候更加恶劣，更加坏。如果纯粹是从去理性角度，我们会提出一套东西。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预测，预测我就预测它的态势，我估计在理性和宿命过程中，中国摆脱不了。

最后我讲一个趋势。在这一轮调整中，全世界就三种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我为了简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实际上美国是比较经典，德国也比较经典，就中国是介于两者之间。

另外对金融闯关，中国这轮闯关，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超级的货币提供者，数量决定质量，所以在未来的我们客观上无赖的这种动作，这种滔天洪水人民币涌向世界，接下来这种洗牌还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分析一下它的残酷态势，然后做一些想法。李克强“强刺激”一出来也是很有理想，李克强经济学，铁路运输量，后来提出去杠杆，去泡沫，微刺激，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以为我们脑袋很伟大，实际上屁股历来比脑袋伟大，今天李克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屁股决定。总而言之屁股让中国在未来年代内不得了。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下半场：与会者的互动讨论

费方域（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首先感谢会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在这么热的市场能够坐下来讨论一些问题，这是很大的贡献。

我简单说一个大的想法。现在我们讲所谓金融闯关，这个词我觉得用得还是不错的。现在这确实是一个最纠结的问题，不往前走这个事情过不了，但是要往前走有风险。实际上这也不是新问题了，为什么要做，做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都说过，围绕这个事情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也讨论过。现在无非就是把这个东西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经济决策，又涉及到利益，就看屁股哪一面推动较厉害。现在来看，这个事情要往前走，看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再讨论的，这个事情肯定要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的是，做一什么工作能使这件事走得好一点，在走的过程中如果出了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可能这样一个思路更好。

因为这个事情从大的格局来说，实际上就是抢发言权的问题，话语权的问题，你在 IMF 有没有发言权。第二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块你现在不做，可能这个时期错过以后，将来要找这个机会就更难。这事第一是对我们国际布局有好处。第二是现在所谓一带一路和亚太行的战略，在欧亚地区，以亚洲为中心，对地方话语权有作用。第三是对国内需求增加的作用。可能从这些角度来讲，有战略意义。

至于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东西，我愿意呼应一下乔会长，因为我们都是老熟人。我问沈晗耀两个问题。第一你说

到社会银行，如果这样一个银行很好，为什么国际上没有这样一个先例？如果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不放在现在的银行去做？还有姜永坤讲的，我们现在搞了半天闯关，结果还是没有价值，那我们何必去搞呢？我是给你一个反馈。我们就是随便聊聊。

沈晗耀：我讲的社会发展银行主要是面对社会事业单位。在国际上，政策性银行只有世界银行，还有亚洲开发银行，这两个的发展和作用都不太理想。中国国开行出来以后倒是比他们两家做得还好一点，国开行影响也开始大一点了。另外，工商企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有限责任，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就破产掉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事业单位，很多都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但它的资产不能抵押。我刚刚讲了，中国经济的现状表面看是过剩，实际深入看还很不足，不足主要是医疗、教育、文化这些方面，还有环境。事业单位很多不是独立法人，不能融资，这就有一个问题。通过政策性金融这样的办法，第一加大财政拨款，第二用社会资金，用金融的办法。我建议，政策性银行支持经济的短板建设，资金都往这里面融，就是这个意思。

费方域：我们就讲医院，你说医院是不是法人单位？

沈晗耀：它是事业法人，但不是盈利性的企业法人。

费方域：它能不能融资？

胡延照（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它实际上也可以融资，但是它不盈利，它还不了钱。你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公共设施这块，除了基础建设，还有底下管道，包括我们上海从嘉兴过来的管道，高架下面是石油天然气管道，这种不出事是很难的。这种事情很多，公共事业不

赚钱，价格又要管制，现在自来水要提价。过去王岐山在北京搞公共交通两块钱很受欢迎，地铁就两块钱，原来100亿北京财政还贴得起，后来200亿，300亿，400亿还贴得起吗？

现在大家说地方债务16万亿。你去看看，比如说做基础设施，修路、修桥、地下管道、环境保护，哪一个是盈利性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做所谓的政治工程，但毕竟是少数。这一块现在是最大的问题，你讲的切中要害。最大的问题是，这块不出钱怎么办？要想办法使这块怎么通过市场化，或者渐进式市场化，或者通过20年时间使这块逐步市场化，使这部分东西既能变成经济性银行的东西，同时又能作为长期投资，这件事情如果能做好的话，这块的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至于产能过剩问题，一般的产能过剩我认为是能够解决的。你一定要想清楚，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要真正跨过所谓的拉美陷阱。我对这个陷阱一直有不同的解释，拉美陷阱是什么？30年代世界上强国的GDP都是7%-8%的增长，后来一直迂回在这个里面。美国第一讲民主化，民主化在经济基础很不扎实的前提下也是一个陷阱，民主化就要许诺了，福利怎么样，工资怎么样，福利工资一提高，外资就撤退。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技术素质，或者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一下子要走到中高端行业是很困难的。我们国家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高端、中高端那么容易呀？全世界都给你做，中国也不能满足9亿劳动力的高档化。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一定是长期存在的。现在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危险。现在这一块到底怎么走？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怎么走，我们都看不明白到底怎么走过去。另外这一块能不能动动脑筋，怎

么样使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怎么样使这块东西能够通过公共产品市场化，或者公共产品模拟市场化，或者公共产品渐进式市场化，或者公共产品通过金融市场，把这一块逐步释放出来，能够使中国保持 10-20 年 7% 的增长，10 年 7% 的增长就翻一番了，这个问题至少已经初步走过去了。

当然你要成立一个社会发展银行现在比较困难，哪一块由谁来承担要动脑筋，方向是明确的，逐步把它拓宽。

地方债务融资，本来就是政府做的事情，就是财政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快速城市化，不能按部就班来做，所以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投资平台来做。过去主要是靠土地财政来解决。说老实话，土地财政不做也得做，做也得做，一定要想办法。我当区长的时候就希望地价高，它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土地财政这一块相对来说少了。现在教育资源不平衡，我们上海的教育经费我认为现在已经过剩了。当然我也赞成一定要跟财政收入统一，但是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平衡，又变成计划经济了。这一块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通过省市资源置换，或者市场价格资源置换，走一条模拟市场经济的路出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估计是很难的，讲讲容易，做做非常难。

关于银行体系不匹配的问题，我很欣赏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很欣赏城市信用合作社，在 1990 年代或者 1980 年代后期，乡村企业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总归有点风险，我们一有风险就要收，有风险不是改革，有风险就收。其实一个县里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只投一个 30 万的小项目，它怎么会给你做呢？你讲普惠金融，一定要跟信用经济结合起来，这块东西不要走国有，就走当地发债，不行的话

加点政策性的，前面做好了，后面的东西就慢慢做起来了。

乔依德：在座还有几位没有发言的，你们要不要发言？媒体也可以提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前面几个发言都不错，张晖明主要讲上面存在哪些问题，效果可能会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姜永坤、王德培从各自角度讲了矛盾。沈晗耀讲到现在私人品过剩，但公共品没有过剩。你仅仅是说需要，但你没说这个银行怎么运行，比如说资金怎么来。储户可以把钱放在工商银行，但为什么放在社会发展银行，存款利率是怎么定的？如果你投的都是不赚钱的，你的收益从哪里来？或者以后不赚钱，变成股权，它是非盈利的，你有股权有什么用？这些问题要解决。

但国外其实还有成熟的解决办法。比如说现在讲的PPP，不盈利可以通过发地方债券。地方债券有两种，一种叫一般债券，还有收入债券。这个项目有现金流，老百姓买可以有税收上面的优惠。我觉得你的问题也很对，为什么全球没有这样做，因为它有客观的因素。我为什么存钱在你那里？如果你给我的回报和工商银行一样，你投的东西又不盈利，你说亏了钱变股权，对我来说股权没有意义。像我们基金会，就算赚了钱也不属于个人，是属于这个社会。

张晖明讲到资本完全开放，你要仔细读周小川讲的话，千万不要小看央行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他讲得很清楚，以前都说资本帐户开放是完全开放，金融危机以后不这么说，我们是有管理的开放，这里还会保留一定的东西，不会完全开放。我也认为改革当中风险最大就是资本帐户开放，其他都在国内比较好弄。利率差不多已经都开放了，除了存款利率。

胡延照：存款利率现在模拟市场化。

乔依德：我也很同意刚才费方域讲的。讲穿了，我们说这些话讲到底也没有什么用，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出主意，在基本方针已定的情况下，看怎么把风险最小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早一点做预防。

王德培：有的时候讨论再收敛一下，我在想具体有三个角度，不是三个都讨论，时间也不够。一个讨论股市，股市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的，这个股市是水晶球，围绕中国股市特定它里面反应未来的趋势。关于政策银行在我们证券修法，商业银行修法背景下，中国未来究竟走混合经营这个大潮，还是走越来越带有梳理，精准的定向，这个也是一种。混业如果是一个大潮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很小很小的。我的意思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大很大，我在想我们民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一定走以往知识分子一定为你当官出点子，我们讲一种判断就 OK 了。

我们民间圆桌会议应该和以往的那些圆桌会议有点不太一样，能够经常讲一些新的思路对人家有一些启发，然后逐渐形成特点。

上海金融业占上海 GDP 增长的一半以上，一季度 58.7% 打个比方，而这一块恰好是全国金融标志性领域在上海。

GDP 的比例，我们以为金融业在支撑，但是这些支撑是虚的，是面子上，这个我讲的第一个。第二目前在上海，你可以说它有好多金融，但是这些金融都是国家，不是地方上海的。第三这一轮金融大潮，或者一个年代主要体现在资本帐户，在我们脱媒过程中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它往往和你当地的经济和实体经济和科研都是有

结合的。我估计在未来一个年代，两个城市它的权重相对弱，其他城市它的权重相对上升。

费方域：你这个观点成立，上海两件事全失败了，一件事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彻底失败。第二件事是自贸区彻底失败。

王德培：你这个是极端的评价。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第一香港它将越来越中性，我在香港就在讲这个观点，港币越来越接近死亡，香港在金融权重越来越下降，香港在今后几年越来越融入珠三角。上海这种特定的情况，我只能用一句话“你懂得”这个词，上海不可能拿出很厉害的招数，这些招数拿不出来，大家都在唱这个事情，我认为上海是中性。像欧洲在未来一个大格局中，只有中国和美国，上海未来就是横盘，在横盘过程中不进则退，要么讨论上海市金融纵向，要么讨论股市，要么讨论究竟中国未来经济大潮哪一些为主。

乔依德：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就讲四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深圳很活跃，但是北京资产大量集中，广州相对是下降的，他认为上海以后还可以上来。北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上海了，这两年北京的GDP增长都比上海高，去年是7.2，上海是7.0。北京那边钱最多，我今天看到公募基金北京最多，这就是你说的“你懂得”。

王德培：上海市民已经被诱惑着，万民空巷、全民炒股，已经在走香港的路子。如果上海精明的市民已经陷入那个泥潭，上海还有什么科创中心。上海未来得在下一个未来10年。

沈明（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据我所知上交所和新加坡正在进行沪新通的谈判，2016年和

2017年可能还要做沪台通。人民币国际化除了我们国家建立离岸的汇率市场以外，还需要有一个离岸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丰富它的市场机制，要不然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将十分缓慢。第二，现在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境外收购兼并外资企业的时候，包括华为、中兴碰到的问题是司法问题。如果通过资本市场兼并，相对来说简单些，在美国、印度或者在南非它的市场阻力相对少一点。第三种它还有一个最深刻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深远的，以后中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它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发境内人民币债券，完全可以发离岸人民币债券。最近农业银行在德国发了一个农业银行三年期银行企业债，这个在德国受到空前的欢迎，德国本身人民币和外币存款利率非常低，它就这样做了。所以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光靠银行和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是有很大的阻力，建立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兑换、互换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才是富有成效的举措。

费方域：我们互换的布局不得了。

沈明：不排除下来还要和美国建立沪美通，因为MSCI（一家提供全球指数及相关衍生金融产品标的的国际公司）正在把中国的权重指数列入MSCI里面去了，所以这些都在慢慢布局。我觉得中央已经意识到光靠国有企业，光靠央行，光靠外管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杠杆可能有一定阻力。

胡延照：现在沪港已经通了，就可以到香港发债券了？

沈明：完全可以。基金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境外人民币产品。新加坡最大的股票是A50，事实上投资中国50指数，也就是国有银行，它的对接意味着我们国有银行在新加坡又

会有很多散户或者机构成为我们的股东。假设华夏银行或者工商银行以后要发债券，不一定在中国境内面向中国的投资者和机构发，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找到最低的利率发行债券。各位讨论所谓的人民币外币版是不是需要，我认为双轨制货币没有必要。

乔依德：这次改革中对上海有几个利好，审核制到注册制对上海是有好处的。资本帐户的进一步开放对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好处，否则上海做不下去。

沈明：离岸交易所在自贸区筹建。

王德培：我的意思是那些市场起好处都是中央，不管几个通，通到最后还是中央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有一个假定前提，现在面临两种趋势，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们走金融衍生这条路，还有走资本化的这条路。金融衍生我们越来越在向美国，向他们这种机构是金融衍生这个背景的话，肯定前提是好的。如果我们说实体经济，要靠一点德国的话，解决未来的一些就业的话，更多的要向深圳、杭州这样的一种发展，这些发展它是和本地接地气的。

费方域：我认为这次金融改革，上海市最大的得利者。现在上海定位很好，加了创意中心这个定位就好了。上海的市场一起来，好东西一定会来，创新的东西一定会和金融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延伸这块，金融本质上是打成一片的，所以做得深和做得宽一定是同步发展的，你不用操心。现在大的思路是逐渐开始放给市场，只要这条坚持住就行。我们现在问题是要把环境搞上去，司法、仲裁、征信这些东西。

王德培：当前把老百姓正常存款全部弄到理财产品，弄到股市，过去没有那么多的通道，私人不许投资的，现在集中起来了以后，这些钱大量流出去，这个东西我倒是蛮担

心，这次要放，一旦大量一进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受到很大影响。

沈明：沪港通里面有很多创新的东西，举个例子比如说外汇额度审批，包括两岸票的交换，比如说现在持有香港股票这个票怎么拿过来，如果香港人买了工商银行这个票怎么拿过去，怎么行使它的权力。第三两岸通当中出现一头大，比如说现在老百姓投香港的激情高，香港投内地的额度较少，这个怎么平衡，外管局定这个额度怎么用。还有香港的没有涨停板，这是技术层面。你刚才说的就是人民币出去怎么管。

王德培：我感觉到在政策和对策博弈过程中，对策现在是强大的不得了，当然有的时候形成很大后果了，已经酿成那种阶段，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

沈晗耀：我讲的这个银行，一开始就讲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板，主要是指公共品。这块在国际上确实没有政策银行，但它们没有并不一定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跟它们国家有重大区别，我们有公有经济这一大块，政府调控能力很大，这既是我们的缺陷，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30多年高速发展，有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同时也有计划的，这个东西要两面看。根据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应该结合市场化，再结合我们原来政府的功能。正好十八大三中全会也讲了，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搞社会发展银行。它的运营全部是市场化的，吸收存款、往外贷款都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和考核。当然你可能就讲有些地方没有市场化。但是另外还有政策性做法，教育部、科技部，甚至包括水利部有无偿拨款，原来计划经济他们批条子，现在都按照银行来做。关于教育经费，人大

规定要把 GDP 的 4% 跟教育挂钩。

费方域：即使 4%，这个钱也是统计意义上的，并不能把这个钱划到教育部，让教育部来分。为什么教育部比别人分得好？

沈晗耀：它是财政的钱，教育部拿钱过来放在社会发展银行，按照社会经济效率原则来发，有一些必须发而且不会还的，也照样发给他。原来他拿科技部、教育部拨款，拿钱很困难，拿到钱以后就没有主了。而社会发展银行始终有一个簿记，这一年拨你多少钱，下一年拨你多少钱，始终有簿记记录，可提高效率，明确权属。

张晖明：我插一句，我觉得这有点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

沈晗耀：这一块是计划经济。

张晖明：现在供给不足，并不是没有财力，而是我们预算结构有问题。比如说去年 11 月份政府帐上还有 3.2 万亿，李克强就骂了，谁把钱存在那个地方，一定要把这个钱赶到市场上去。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背后都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比如说，没有教育体制的改革，增加教育经费是浪费的。

费方域：我们承认北美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的大学钱哪里来的，一块就是捐赠，一块就是州里面的钱预算。你还要把这个钱收到上面去，还要通过人大通过，还要通过这个银行，还要投，为什么它投的比别人的好？

胡延照：这个是大的体制问题。

沈晗耀：它要走市场化，就按照商业银行存贷款一样的，基准利率工商银行是多少，它就按照多少，完全自由浮动。它还另外从社会上筹集更多资金，然后支持公共事业。

而且银行有一条，它是以效率为主导，不像财政部，不像科技部，所以说可以提高效率。

费方域：我到日本去看过，日本东京地铁下面全打通，地下等于是另外一个空间，不是一层，是几层，投资多不多。为了这个事情我专门到城市里面查这个钱哪里来，他们说你可以看但不能复印，这个钱98%是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可以做这件事情，它一做就是十几年，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你借钱可以不还，我们现在欺诈率是78%。

胡延照：早期的时候没有政策性支持是做不下去的。

费方域：财政拨一块，这个没有关系，你就交给商业银行去做这件事情。

胡延照：我觉得最好是分权。

姜永坤：我们这个论坛要稍微聚焦于上海的一些问题。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一边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一边是国家统一的战略导向，这里面的分工不是很清晰。第二是上海北京的关系，国家层面上没有给上海非常明确的放的说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能就是一些单一功能的推进。上海现在比较缺少上海城市地区战略，这几年就是说二产转三产不等于二产塌陷，虽然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但产业成熟化还是在后面的事情。上海有一个如何在这几年把握机遇形成支柱性的产业的问题。

一个城市过渡的商业化对市民的创意精神是很大的消融，创新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制造业。上海地区怎么议论科创都走不出一条路。就像香港要珠三角，福建拉住台湾，上海还是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做文章，否则上海下一步可能是错位，创新服务不起来，产业集聚跟不上。上海还有一个过早

老龄化的问题，下一步的内生动力都有点问题。

乔依德：我们确定下一次的时间，5月25号，有变化再说。题目定什么？

沈晗耀：大家比较倾向于要谈谈上海。

乔依德：可以呀。

姜永坤：我们接接地气。

沈晗耀：或者科创中心。

乔依德：上海的什么要具体一点。

沈晗耀：科技创新，金融中心还是什么。

费方域：原来我们上海做二产，当时觉得挺好，现在来看观点不对了，没有必要。这个二产可以在其它地方，上海就搞一个销售中心、研发中心就可以了。

乔依德：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姜永坤：我觉得上半场不够深入，也不够聚焦，下半场也不够聚焦。

乔依德：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水平。

姜永坤：程序上有点问题。

乔依德：你觉得要15分钟？

费方域：主办方有水平，10分钟也讲能出来。

张晖明：我们好好做一些加工。

乔依德：我定下来时间就发通知。我先假定你来，除非你有事情，不参加两次作为自动退出。好，谢谢大家！

第3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主题暂定为“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动力”。